



▲蔡元培先生

【文化杂谈】

五育并举的现代启示

□雨茂

1922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请读者投票选出“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在其中两轮评选中，蔡元培一次排名第六，一次第七，位次靠前的有孙中山、顾维钧、冯玉祥等人。胡适也拟定了一个12人名单，分成四个组，在“影响近二十年全国青年思想”的四人中，蔡元培名列第三，排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后，陈独秀之前。不知道胡适想过没有，100年后，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大学建设仍要从蔡先生的思想中吸取营养。

2016年暑假，我随学院到北京大学学习，聆听了蔡元培先生孙女蔡磊珂博士的讲座——《蔡元培教学思想与大学建设》。蔡博士从四个方面归纳了爷爷的大学改革理念：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当时，国家已经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但建设名单还没有公布，全国各地的大学中，有的志在必得，有的翘首以盼，有的希望天降喜讯，有的则心如止水……直到2017年9月21日尘埃落定。自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互联网充斥着各种消息，段子手们尽情地进行言语狂欢，有打趣的，有自嘲的，也有相互揶揄甚至互相拆台的……冷眼旁观之后，也心生一个疑问：怎么实现双一流？急功近利一直是大学建设的顽疾，难道双一流建设也逃不出它的魔掌？

约三十年前，我的大学老师就给我们介绍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并带着崇敬的心情宣讲蔡先生的大学建设理念，在当时的老师和学生看来，蔡先生的理念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后来，我到高校教书，阅读了一些高等教育方面的专著，知道蔡先生的理念并不是他的创造，而是西方高等教育的常识，其中德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思想对他影响最大。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蔡先生的功绩。在一个老旧落后的大国推行现代教育，不亚于让一个习惯步行的人开高级跑车，实际等同于再造国民，难度堪比登天，但蔡先生做到了，除了敬佩，还能对他有更多要求吗？我们常常称颂鲁迅先生在改造国民性中的巨大功绩，对他的文学救国行为不吝言辞，但如果没有新式教育的支撑，文学救国又如何落到实处！

相对于10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物质条件已有天壤之别，国家

能够提供最好的硬件设施，可以建最漂亮的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可以聘请最优秀的师资，可以提供丰裕的课题经费，但高等教育的教学方式、学术研究、管理理念等软件条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虽然高等教育相较100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基本理论是不变的，蔡先生倡导的四大理念历久弥新，对于当前的双一流建设，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无论是建设一流大学也好，还是建设一流学科也罢，需要的是一流学生、一流师资与一流管理。一流学生与师资是最紧迫的，这就回到了100多年前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与教育次长范源濂之间的争论。范先生认为，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而蔡先生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争论的结果是合起来最好，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都需要重视，也需要整顿。问题是怎么结合呢？

1912年，蔡先生撰写了民国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建立起了以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五育并举”思想体系。蔡先生认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隶属于政治，而美育与世界观教育则“超轶”于政治。蔡先生明确指出，“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蔡先生所讲的世界观教育不是通过政治教育去实现，而是通过美育。同时，美育也是打通其他四种教育的纽带与桥梁。至于为什么要倡导美育，蔡先生认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

长期以来，功利主义思想大行其道，体现在教育上则表现为把教育作为改变命运的途径，作为挣大钱、娶美女、嫁豪门的捷径。考大学不是为了完善自己，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和谐的人，而是抱着他种目的，所以要考重点大学，考名校，读就业好，收入高的名校。为了考入知名大学，就得上知名幼儿园、小学、中学；为了考高分，就要牺牲美育、德育与体育来“成全”。缺少美育的智育是畸形的，缺少德育的智育是危险的，缺少体育的智育是令人后怕的。蔡先生认为美育是无差别、超功利的，缺少美育，就无法使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甚至导致创造精神的缺失。“美术所以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创造精神……美术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表个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冲动，逐渐减少；创造的冲动，逐渐扩展。”怎么实施美育呢？蔡先生认为主要通过音乐、美术、手工与游戏，另外，在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等智育课程中，也有美育元素可供开发。

基于以上论述，五育并举在当下依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大学居于教育生态链顶端，如果不把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纳入五育并举体系中去观照与思考，如果片面强调某一种教育，或者机械理解推行，就与蔡先生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了。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社会观察】

台北『中研院』访问记

□伍国

2018年初，我第二次来到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是在2015年年末，来这里参加一个明清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这次是为搜寻一些和我目前的研究有关的资料，也为了躲避美国北部的严寒。“中研院”位于台北市南港区的东端，出了地铁（台湾叫捷运）的最后一站——南港展览馆，仍然要坐几站公交车，或者走上20分钟，如果打计程车，则车资刚刚超出起步价。可以想象，在当初选址和修建的时候，这一带是个偏远僻静的所在。

这种偏远，正体现了选址者的用心，让“中研院”成为一个类似位于市郊的大学校园一样远离尘嚣、内部开阔又相对独立的园区，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它的各种研究所、博物馆、会议中心、宾馆（正式名称叫“学术活动中心”），还能设计出一些精巧的景致，让人在其间散步的时候，有置身公园的感觉。在侧门处，有一个小小的邮政所，甚至有一个半内部的小超市供应生活用品，按台湾的习惯叫做“福利社”。

我携家人在“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住了十天，每天去几个地方查找资料：傅斯年图书馆、郭廷以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档案室。承史语所的所长王明珂教授帮我办了一个贴照片和过塑的访问学者证件，这样我可以进入这些地方的书库。实际上，在我拿到证件之前，也曾经可以向档案管理人员申请调阅一些资料，只需口头说明一下即可。管理员会问一下，是否还在等待证件？然后体谅地说，因为刚刚来还没有拿到手吧？但绝对没有人严厉地执行规定，把访问者拒之门外。可以说，这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员都专业、高效而又友善，通情达理。进入图书馆以后，电脑和各种中英文数据库都可以自由使用，甚至连用户名、密码都不需要——只是打印资料的时候要付点打印费而已。

正因为这种便利，我得以查阅并很快就方便地打印了去年才扫描上网的丁文江云南考察笔记的手迹。世人一般只知道丁文江是我国二十世纪著名地质学家，而我看到的资料是丁文江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和记录。可以说，仅凭这两项稀见手迹，这趟已经是很值得了。

除了对研究工作的完全配合，“中研院”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对文物的保护和对重要学人的纪念。不仅史语所和近史所的图书馆分别以首任所长傅斯年和郭廷以的名字命名，在傅斯年图书馆内还有一间清幽的傅斯年纪念馆，陈列傅斯年的手迹和生前物品。同样，在郭廷以图书馆内，也有一间专门的郭廷以纪念室。当然，最值得一看的，还是胡适纪念馆。这里有胡适生平展览、藏书和胡适故居。独栋别墅的故居内有胡适当年在“中研院”院长任内的书房、卧室、会客处等日常起居之处。我们参观的时候，遇到的讲解员是一位亲切温和的退休女士。和台湾

很多名胜、纪念地一样，担任讲解的人往往是义工。

从“中研院”的侧门出来过马路，有一间“胡适国小”。在这附近，还有座胡适公园步行可至，主要是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合葬墓地。墓地建在一座小丘上，背山，面朝“中研院”园区。在公园的入口，也就是将要登上小山的地方，还有个环形的石碑群，分别以胡适的手迹刻着他的一些经典格言警句，例如非常直白但值得反复品味的“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等等。

蔡元培纪念馆是位于园区内的一座小坡之上的现代建筑，也作研究人员和职工的休息和聚会用。

“中研院”史语所的档案馆旁边是一座精心维护和管理的高层历史文物陈列馆。这座博物馆里陈列有殷墟甲骨、青铜方鼎、居延汉简、大内档案以及属于山东龙山古文化的黑陶器等，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如傩戏面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列馆内的宣传介绍手段也比较亲切和有互动性：参观者可以自己用蜡笔制作拓片，还可以领到一只竹筒，然后用毛笔蘸墨，想象自己像秦汉时代的古人一样，在竹筒上竖着写下一行小字。

大楼的五楼是史语所办公区。我在这里短暂地拜会了所长、人类学家、哈佛博士王明珂先生。王先生曾在我的出生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汉族杂居地区从事几十年的田野调查，撰写名著多部，还会说几句四川话。他待人温和、客气，但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对美国的一些中国研究学者的批评时，却是十分严厉的。

作为一座宾馆来说，“中研院”的学术活动中心价格低廉，但也算是设施比较简陋的，比如只有空调，没有暖气，而空调也只能开和关，不能自由调节温度。每天的早餐地点其实是二楼的一个大教室似的饭厅，墙上还有块黑板。不过，由于这里基本上接待世界各地从事访问研究和出席会议的学人，也算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至少看不到吵吵嚷嚷的旅游团。虽然简单如此，在学术活动中心的地下室，却设有一个不错的学术书店。有时，在同位于地下室的自助洗衣房洗衣服的时候，在等候的间隙，住客可以逛到书店里来看看。我这次在这里买了一本一直想买到的书：史学大师岑仲勉的《隋唐史》。

学术交流中心总台可以帮忙约去机场的计程车，在我们离开的时候，遇上的司机是山东籍“外省人”。当年他的祖父和父亲两人辗转来台，祖父因为忠诚于留在家乡的祖母而终身不再娶。一路听他聊天，也感受到了历史在普通人心灵上留下的印记和强烈的家国情怀。

（本文作者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